

从昭和研究会看战争中的日本知识分子

史桂芳 王 柯

内容提要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的日本侵华战争中,日本知识分子十分关注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主动研讨对策,为政府充当参谋和智囊。昭和研究会是战争时期日本知识分子团体,该会协助近卫组阁、参与调整对华政策、策划新体制运动。透过昭和研究会我们可以了解战争期间日本知识分子及其团体为确保既得侵略利益的活动,认识知识分子与政府、与战争的复杂关系。目前国内学术界少有关于日本知识分子及其团体的研究,作者期待通过探究昭和研究会的沿革、主要活动、历史作用等,进一步拓展抗日战争史的研究领域。

关键词 侵华战争 昭和研究会 近卫内阁 协同主义

1931年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开始了长达14年之久的侵华战争。在侵华战争期间,日本许多知识分子不再清高、空谈,而是主动了解国内外大势,商讨对策,直至为政府充当参谋和智囊。昭和研究会作为战时成立的日本知识分子团体,它组织各种专门的研讨会,讨论日本面临的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问題,力图对政府施加影响。昭和研究会近卫组阁、日本政府调整对华政策、实行国内新体制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透过昭和研究会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知识分子对战争的态度,明了知识分子与政府侵略政策的关系。

一 昭和研究会发起及组织构成

昭和研究会是由近卫文 的密友后藤隆之助于 1933 年创立的知识分子团体。当时日本已经完全占领中国东北,在东北扶植傀儡政权——伪满洲国政府,日本退出国联,改变了“协调外交”政策。在这种形势下,后藤隆之助等知识分子十分担心日本因此在国际上处于孤立的境地,他们决定组织国策研究机关,研讨国内外形势,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参考。1933年10月1日,在东京成立后藤事务所,12月正式定名为昭和研究会。

《昭和研究会设立趣意》中,提出研究会的目的在于:“根本改变日本在世界上的经济、政治地位。综合动员朝野所有的智慧和经验,实行朝野一体的总动员,充分疏通官僚、军部、实业界、学界、评论界等各方面的思想,综合各方面的经验和智慧,树立真正的国策。”^① 昭和研究会由常任委员和委员组成,常任委员是机构的核心。昭和研究会下设各专门委员会,如教育问题研究会、农村问题研究会等,1937年又增设了政治机构、外交、经济、金融财政等专门委员会,各官厅、各界有影响力者参加各专门委员会。1938年随着侵华战争的扩大,专门研究会数量进一步增加,研究会发展到有世界政策、政治、经济、世界、文化等5个领域、共16个专门研究会。各专门委员会设委员长。常任委员会是昭和研究会的最高决议机关,他们根据各委员会的讨论情况,综合判断政治经济动向和形势,决定最终的政策大纲。常任委员和专门委员自昭和研究会成立到解散,人员构成基本稳定,变动很小。

昭和研究会集中了当时日本媒体、文学、经济、政治、教育等各

① [日]酒井三郎:《昭和研究会》,讲谈社1985年出版,第51页。

方面的人才。研究会每周举行一次会议,综合分析国内外形势,撰写研究报告。参加昭和研究会者均为兼职,研究会的委员们都是晚间参加会议,且不领取任何报酬,但是,他们的热情非常高,经常为解决日本面临的各种“悬案”通宵达旦地讨论,不时有激烈的争论。

昭和研究会对各个研究会的成果基本采取以下三种方式处理:一是对于紧要问题,综合各方意见,向研究会成员传达;二是将研究报告印刷若干份分发给常任委员和委员;三是用活字印刷的方式向有关的团体、个人分发研究成果,使社会广泛了解昭和研究会的活动状况和成果。昭和研究会后期多采用第三种方式以扩大其影响力。1940年日本开展大政翼赞运动,成立大政翼赞会,昭和研究会解散。

昭和研究会自成立之日起就认为:“他们不是为了近卫一个人而进行研究,而是为了处于激荡时期的日本、为了他们自己来认真研究日本的发展政策”^①,他们把知识分子与日本对外发展联系起来,认为如果离开了日本的命运也就谈不上自己的命运,对处于风云变幻时期日本命运表现出极大的关心和忧虑。

二 昭和研究会的主要活动

参加昭和研究会的知识分子以关心国家前途、关注日本发展为己任,从成立之日起就把重点放在研究日本的政治、经济、社会、外交、军事等方面,政治色彩和倾向十分明显。昭和研究会的活动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提出协同主义理念,鼓吹日本文化、日本精神的优越性,

^① [日]酒井三郎:《昭和研究会》,讲谈社1985年版,第283页。

企图以协同主义来代替三民主义,用协同主义化解中国的民族主义,麻痹中国人的斗志。昭和研究会成员多数非政府官员,他们主要通过思想理论来影响政府。昭和研究会下的各个分会,在研究讨论中,发表了不少研究成果和报告,其中《新日本的思想原理》、《协同主义的哲学基础》、《协同主义的经济伦理》、《纲领》等最具有特点和影响力,也可以说是他们的标志性成果。东京大学的教授蜡山政道曾连续在《改造》等杂志上,发表关于东亚协同体论的文章,研究会的加田哲二、山崎靖纯、三木清、三枝博一、船山信一、尾崎秀实等发表了很多关于协同体论的文章。^①

昭和研究会认为卢沟桥事变,“从时间上说是解决资本主义的问题,从空间上来讲,是实现东亚统一。因此,事变本身具有世界历史意义”。^②因为现在世界形势的发展,把一国作为经济单位实行自足已经不可能了,建立包括日、“满”、华在内的东亚协同体是时代发展的需要。而“东亚协同体不仅包括经济集团,还应在政治、经济、文化、国防等诸方面形成日、‘满’、支的连环,这样协同体才名实相符”。^③昭和研究会认为要建设东亚协同体,就必须形成“东亚文化”。日本文化在建设东亚新文化中具有指导意义,“日本文化是以世界无与伦比的一君万民国体为基础的,是协同主义的根本所在。日本文化具有特殊的包容性、进取性和智慧性”。^④日本精神、文化不仅是日本的,还应向东亚传播,在东亚协同体的建设中大放光芒。协同主义作为东洋思想可以纠正西方思想。

昭和研究会提出协同主义思想的目的,是为使陷于长期战争

① [日]冈本幸治主编:《近代日本のアジア观》,ミネルウァ书房1998年5月出版,第233页。

② 《新日本的思想原理》,载《昭和研究会·资料》,第318页。

③ 《新日本的思想原理》,载《昭和研究会·资料》,第319页。

④ 《新日本的思想原理》,载《昭和研究会·资料》,第328页。

泥潭的日本政府在中国拔出脚来。昭和研究会认为要达到此目的,就必须使执掌中国大权的蒋介石国民党接受建设东亚新秩序方针。昭和研究会成员竭力寻找协同主义与三民主义的共同点,阐述东亚新秩序与中国近代以来的发展相一致,说明只有协同主义才能实现中国建设近代国家、摆脱西方殖民统治的目的。昭和研究会多次讨论协同主义与三民主义的关系问题,认为三民主义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尽管理论上自相矛盾,但是其内容是不可分割的。从三民主义的内容来看,单纯的民族主义已经不符合时代的理想,民权主义就是自由主义,这是现在必须超越和克服的思想。“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相联系,社会主义有通向共产主义的危险。东亚协同体建设对中国来说是崭新的道路,用新的协同主义代替三民主义,就能实现三民主义的理想,特别是民生主义的要求,形成新的东亚独特的文化”。^①他们认为三民主义会陷入排外主义、抽象的世界主义共产主义。要用协同主义消除中国的民族主义,把中国争取民族解放的抗日战争引向与日本合作建设东亚新秩序的道路上去。他们认为与中国战争不仅是军事较量,还应包括思想战,思想战绝不仅仅是宣传活动,其根本在于确立新的思想原理。这个新思想原理就是协同主义,它也是建设东亚新秩序的指导思想。

昭和研究会认为协同主义原理“从更高的角度超越了已经破产的近代主义,比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全体主义等体系更具有优越性。它立足于传统,又非单纯地复活封建的东西,亦非止于空疏自负的言辞。它通过对东洋文化和西洋文化的新反省,站在现

^① 《新日本的思想原理》,载《昭和研究会·资料》,第326页。

在的历史阶段,是应世界环境而生的思想创造”。^① 协同主义是超越了民族的东洋文化,“东亚协同体不是简单的民族主义,它具有民族协同的含义,因此,要超越单纯的民族主义立场,但是又承认协同体内部各民族的独立性”^②,协同主义要以日本精神为指导,但协同主义是集西方东方文化之大成,它又不仅是东亚地区的特殊的理想,而且是对世界和平有积极贡献的普遍原理。

昭和研究会注意到中国民族主义所蕴含的巨大力量,他们认为“中国以低下的经济力量、不完全的政治体制、贫弱的军队抵抗到现在,这实际是民族问题”^③,主张以协同主义化解中国的民族主义,使国民政府走上与日本合作的道路。

第二,支持近卫文 组阁,希望近卫内阁接受协同主义主张,尽早结束中日战争。1937年6月第一次近卫内阁成立,昭和研究会对于贵族出身的近卫文 寄予无限希望,研究会的发起者后藤隆之助是近卫内阁的智囊之一。近卫内阁成立后,昭和研究会各个专门研究会异常活跃。昭和研究会感到华北形势紧张,为此,他们成立了中国问题研究会。中国问题研究会对于西安事变后的形势做了分析,认为:通过西安事变可以看出南京政府统一力量受到削弱,南京政府为了加强其力量必然会在政治、经济、财政等各个方面加强力量;蒋介石为了完成中国的经济建设会极力避免与日本特别是关东军发生摩擦。尽管尚不能根本调整日本与中国的关系,但是,日本也要积极在华北建设缓冲地带,解除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因为中国共产党会以日本的压迫为由,实现赤化。如果那

① [日]三木清:《续新日本の思想原理 协同主义の哲学的基础》,《三木清全集》第17卷,岩波书店1968年版,第535页。

② 《昭和研究会》,第321页。

③ [日]尾崎秀实:《“东亚协同体”の理念とその成立の客观的基础》,《尾崎秀实著作集》第2卷,第312页。

样,日本周围就会被赤色势力包围,因此,日本必须完成国防线的建设。^①昭和研究会对于国民政府的国防建设,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充满恐惧,希望日本政府采取措施,缓和紧张的中日关系,从根本上维护日本的利益。

近卫内阁成立后一个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关东军立即调兵,做好随时入关支援华北的准备。7月8日,日本陆军商讨对策。以陆军大将杉山元为首的多数人主张扩大事态,认为这是解决中国问题“千载难逢的良机”^②,而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石原莞尔认为中国具有一定的抵抗能力,凭日本现在的兵力,一旦对中国全面开战,很可能陷入长期战争不能自拔,主张应就地解决,避免事态扩大。日本政府为了争取时间,确定了“不扩大”方针。昭和研究会的外交问题研究会和中国问题研究会立即会商,他们不希望事态扩大,主张就地解决事变,认为就地解决、把事变限于局部,有利于维护日本的既得利益。昭和研究会认为解决事变的最好方法是近卫首相去南京,直接与蒋介石会谈。即使交涉没有结果也可以让世界看到日本对和平的诚意,使日本在国际上处于有利态势。当然,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企图“三个月灭亡中国”,根本没有把国民政府放在眼里,昭和研究会希望近卫首相去中国与蒋介石直接会谈的建议自然没有被政府采纳。

昭和研究会的后藤隆之助和酒井三郎为了解事变后中国的情况,1937年10月到中国东北和华北等地进行了考察。通过现地考察,他们看到中国正在为建设近代国家而努力,他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只要日本不停止分裂中国的企图,战争就不可能结束。即使退到云南、四川这样的地区,蒋介石也不会低头。蒋介石的国民

① 详见《昭和研究会》,第73-74页。

② 《现代史资料12 日中战争4》,东京,みすず书房1973年版,第125页。

运动遍及中国各地,国民党是国民运动的中心,如果不与党首蒋介石握手,和平就没有希望”^①,他们希望政府重视蒋介石及国民政府,认为中国民族主义有力量,要实现日本的利益,就必须与蒋介石合作。

事实证明日本提出的“不扩大”方针不过是缓兵之计,1937年12月日军攻占国民政府首都南京。1938年1月16日,近卫内阁发表了著名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府声明,声明公然叫嚣“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待中国建立能真诚与帝国合作的新政权,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复兴的新中国”^②,18日,日本政府又发表了补充声明,强调“所谓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较之否认该政权更为强硬。从历来的国际法来说,为了否认国民政府,只要承认新政权就可以达到目的。因为尚未到达正式承认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时期,所以,这次开国际法上的新例,在否认国民政府的同时,将它彻底抹掉”。^③昭和研究会认为这个声明断送了和平的道路,对近卫既表失望、愤懑,又有同情。由于昭和研究会的地位以及他们与日本政府,特别是近卫之间的微妙关系,他们又不愿也不敢去直接指责近卫本人,而把战争不断升级、扩大的责任完全归咎于军部,为近卫开脱责任。“内阁自身并不知道军部的方针。尽管内阁想从军部了解战况的进展,但是,军部以统帅权独立为由,根本不在内阁会议上报告,即使报告也不过是形式上的”^④、“尽管近卫一贯持不扩大方针,但是军部无限扩大事变”。^⑤

① 《昭和研究会》,第86页。

② 《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下)》,原书房1978年版,第386页。

③ 《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下)》,原书房1978年版,第387页。

④ 《昭和研究会》,第96页。

⑤ 《昭和研究会》,第98页。

国民政府在首都南京被攻占后,迁都重庆,继续抗战。鉴于中日战争陷于长期化的态势,日本政府为早日结束中国战争,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了“虽国民政府,亦不拒绝”的声明。在这项声明中,日本提出“帝国所期求者即建设确保东亚永久和平的新秩序……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①该声明改变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策,希望国民政府进行适应日本政策需要的改组后,参加东亚新秩序的建设。

1938年11月30日,日本御前会议做出《调整日华新关系方针》的决定,提出“在互惠的基础上,日、满、华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②三项原则。12月22日,日本首相近卫文发表了第三次对华声明,重申“日满华三国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联合起来,共谋实现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③的原则,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近卫三原则。第三次近卫声明的发表,表明了日本对华政策从速战速决发展为军事打击和政治诱降相结合,企图通过“以华治华”,分化中国的抗日营垒,达到侵略目的。

昭和研究会对建设东亚新秩序表现出极高的热情,他们认为日本的使命就是建设东亚新秩序,并在解决中日战争的同时,传播日本文化,创造符合时代精神的日本精神。当然,日本建设东亚新秩序并没有得到蒋介石的呼应,也没有改变国民政府的抵抗态度,除汪精卫集团叛变外,广大的中国军队和人民在艰苦的环境下依然坚持抗战,日本提出的建设东亚新秩序只能以失败告终。

第三,建立东亚协同体,在协同主义的旗号下确保日本在中国

① 《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下)》,第401页。

② 《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第405页。

③ 《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第407页。

的侵略利益,达到军事侵略难以达到的目的。随着中日战争的长期化,日本作为一个地小人少、资源匮乏的国家,经济问题日益凸显。这时的昭和研究会集中研究东亚集团经济问题,提出东亚经济协同体的概念。认为只有建立日本、中国和“满洲”的东亚集团经济,才能促进东亚经济的发展,实现“产业国和落后国、工业国和原料国的结合,实现两者互通有无、平等互惠关系”。^①这其实就是为了满足日本的战争物资需要。昭和研究会认为日、“满”、华集团经济的目标,从日本来看就是确保军事上必要的物资,日本要从中国进口的不是粮食,而是煤炭、铁矿石、各种金属、盐、棉花、羊毛、桐油、烟草等原料。为了解决日本地少人多问题,昭和研究会还在1940年9月制订了长达500页的《关于促进国土计划的意见书》,该意见书把日、“满”、华都设定在国土计划之中,提出要向“满洲”大量移民,重新调整国土内人口、产业、交通粮食等方面的布局。昭和研究会将计划书大量印刷,在向政府提出该计划书的同时,还向相关部门大量散发,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为了研究在“满洲国”如何实现日“满”华的国土计划,昭和研究会的佐藤弘等还亲自去中国东北进行调查。他们强调协同主义实践与理论同样重要,在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实践中,必须进行实证性研究。到中国东北调查就是昭和研究会将自己的理论付诸实施的表现,表明他们对于夺取东北资源的重视。

昭和研究会认为建立东亚协同体对外是建设东亚新秩序,对内要对日本的政治体制进行改造,以使日本更好地担当新秩序的领导者,为解决中日战争、维护日本既得的侵略利益提供条件。认为“新日本的思想原理是协同主义。协同主义是国内新体制的准

^① 《昭和研究会》,第135页。

则,是东亚新秩序的指导精神”。^①

昭和研究会成员是知识分子,他们对日本军人独断专行、干预政治很不满,希望近卫建立强有力的内阁,避免军人对政治的过多干涉,昭和研究会认为“在中日战争期间曾出现多次解决事变的机会,但是,这些计划都被军部破坏了”。^②因此他们提出建立直属天皇的“国防御前会议”,以限制军人的权力,并对日本现有政党进行重组和改造,加强政党的权力。他们认为日本现有政党存在许多问题,与日本领导东亚新秩序建设不相符合,政党“浮在国民各层的上面,不能提出打开非常局面的政策,他们只代表部分人的利益,为此相互竞争,分散了国民的力量。因此,不能形成团结全体国民代表其意志的政治‘力’”^③,应该解散现有的政党,建立代表国民全体利益的有力组织。近卫赞成昭和研究会对于现在政治体制的认识,希望依靠国民组织的力量压制军部,解决中国问题,日本新体制运动由此展开。新体制运动开展后,日本既存的政友会、民政党、社会大众党等先后解散,为建立举国一致的体制创造了条件。近卫希望日本各界结为一体,实现“一国一党”的新体制。近卫认为新体制运动的目的在于大政翼赞,实践臣道。1940年10月,成立了大政翼赞会,近卫任大政翼赞会总裁。昭和研究会成员积极参与大政翼赞会的活动,有马赖宁、风见章、后藤文夫、后藤隆之助等人为翼赞会的核心人物,很多昭和研究会的相关者也参加了大政翼赞会。昭和研究会在新体制运动中,更多地投入到新体制的建设和翼赞政治中,1940年11月19日,研究会宣布解散。

昭和研究会为日本维护日本的利益可谓“殚精竭虑”,他们以

① 《昭和研究会资料》,第331页。

② 《昭和研究会》,第118页。

③ 《昭和研究会》,第204页。

与军人不同的面目来构想如何结束战争,怎样化解中国的民族主义,但是,昭和研究会提出东亚协同体和国内的新体制构想并未能挽救日本失败的命运。

三 昭和研究会给我们留下的思考

昭和研究会作为日本国内知识分子的团体,他们在战争期间一改知识分子远离或者淡漠政治的传统,主动分析国内外形势,力图在最大限度上影响政府,维护日本的利益。尽管日本政府因发动侵略战争遭到世界人民的抵抗而失败,但是,昭和研究会还是为我们留下了很多值得总结和思考的问题。

首先,昭和研究会作为知识分子团体积极参与政治,对培养日本官僚政治人才、训练官僚制定策略的能力产生了深刻影响。昭和研究会无论是通过协同体理论,还是研究会主要成员充当近卫内阁的智囊,都在有形或者无形地影响着日本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和政府的内外政策。日本的国内新体制运动、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对外政策,都可以看出昭和研究会影子。

其次,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日本知识分子与军阀是有区别的。诚然,昭和研究会作为知识分子的团体,关心政治、提出政见是为了维护日本既得的侵略利益。但昭和研究会与军阀的不同点在于,他们少了些轻狂,承认中国民族主义的力量和要求,重视民国建立以来中国的发展变化,认为这时期的中国人与清朝时不同,对于中国仅靠武力征服是不行的,关键是征服中国人的思想,即用协同主义克服中国三民主义的影响力,促使中国与日本合作,以真正取得日本在东亚的领导地位。从这点来说,昭和研究会是在实现日本侵略利益方面,比明火执仗的武力侵略更加具有欺骗性和危险性。因为军事进攻很容易受到被侵略国家人民的抵抗,而思想、文

化上的渗透和侵略是隐蔽的。所以,我们对于抗日战争的研究不能仅陷于军事、政治、外交,必须重视思想、文化的侵略。值得注意的是,昭和研究会能在诸多方面为政府提出参考意见,与他们灵通的信息系统分不开。因为他们与近卫关系密切,通常能得到一般人不能得到的情报,有这些情报做基础,他们对事情的判断有一定的预见和客观性,这又为他们影响政府提供了条件。昭和研究会通过参与政治,自觉地发挥在战争漩涡中的政治作用,以此希望自己的理论研究成果和政策,能够变为现实的改革运动。其实,在相当的程度上,昭和研究会达到自己的目的了。昭和研究会成员战后回忆起曾经的活动,无不感慨没有阻止中日战争扩大,“既是近卫的悲剧,也是昭和研究会的悲剧”^①,对日本战败抱极大的遗憾。

再次,昭和研究会成员是日本著名的知识分子,他们具有比较高的理论素养,他们在哲学、历史学等方面曾取得一定的成果,在日本思想史上留下了不可抹去的一笔。战后日本出版了三木清、尾崎秀实的著作集等,也为我们研究战时日本思想、社会留下了宝贵的资料。昭和研究会的情况比较复杂,也有左翼人士参加,如尾崎秀实,他们对日本武力征服政策提出过批评。尽管他们是左翼人士,战争结束前被日本政府杀害,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对侵略战争的认识不可能像中国人那样深刻,也不可能像今天这样明确。左翼人士与昭和研究会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问题,也是另外一个研究题目了,留待以后研究。

(作者史桂芳,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教授;
王柯,日本神户大学国际文化学部教授)
(责任编辑:徐志民)

① 《昭和研究会》,第 285 页。